

丁  
巳  
夏  
月

# 新闻业务

XINWEN YEWU

活叶版

24

总 1573 期

1978年6月7日

新华通讯社编

内刊刊物 注意保存

## 目 录

陈伯达姚文元炮制黑文《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罪证……（1）

“闹而优则仕”不可演绎成“唱而优则仕”……（4）

**编者按：**现将《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报纸动态》特刊上登载的《陈伯达、姚文元炮制黑文〈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罪证》转载于此，供大家研究、批判。陈伯达、姚文元炮制的这篇黑文（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编辑下文章），是林彪、“四人帮”在新闻领域兜售“黑线专政论”的代表作，流毒很广，必须深入批判。现在这份材料，主要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的，其中包括姚文元、陈伯达的批语和参改。为了便于查对原文，本刊转载时作了一些注释。

## 陈伯达姚文元炮制黑文《把新闻战线 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罪证

### 姚文元的“批示”和参改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姚文元退回送审稿，他在样子上的“批示”和一些重大的多改，依次如下：

一、批示：“此件试改了一下，没有改完。请你们再加以参改。所提一些个人意见，供参考。若干引文没有出处。改一边后，再打几份样来。此件用后退回。姚文元 七·二一”。

二、姚在文章开头加了一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战线上经历了和经历着十分尖锐和剧烈的阶级斗争。”在第二段讲完无产阶级以后，姚又加了一段：“资产阶级也力图夺取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散布反革命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

（注：这段话发表时改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

三、原稿中开头下分第四段的第一句原为“大叛徒、党内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姚改为“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注：重点号是编者加的，下同）。原稿中下一句原为“每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他（指刘少奇）都亲自出马，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妄图扭转我国新闻事业的方向”。姚改为：“他们代表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在开头下分第五段中姚加上：“那些被反革命分子篡夺的新闻单位，又一个一个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然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报纸领导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注：这段话的头一句在发表时改为如下两句：经过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了。他们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四、此文的第二大下分（小题为：中国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方针和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第二段，姚文元在概括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时，加了一段：“总其一点，是赤裸裸地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

五、在第二大下分第十三段讲到五七年新闻界的斗争一段旁边，姚“批示”：“加上：邓拓公然抗拒毛主席指示，保护毒草不在报上暴露，毛主席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

六、在本文第三大下分（小标题是：一个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的反革命策略）的第三、四、五、六段，讲到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提出报纸要“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邓拓在“神仙会”上提出要“努力打开一条新路”时，文章例举了报纸广播出现了《长春录》、《燕山夜话》、《历史故事》等等，姚在这一段旁边“批示”：“应当指出：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报纸。”

七、在第三大下分第八段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的一段旁边，姚“批示”：“这一段批判不透。实际上，这是反革命大毒草在‘实际’中疯狂出笼的时期。”

八、本文第五大下分（小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破产）第三段说：“新闻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已开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国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统治势力，全面崩溃了。”姚在这里加了一段：“那些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一个一个被封了，被革命派夺了权，好得很！好得很！”

九、文章最后用毛主席的语录，概述了六条“毛主席办报思想的主要内容”。姚在旁边批道：“这几条读再酌。”

十、在最后一段旁边，姚批道：“应有一段，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在当前的表现，包括反革命分子的造谣、诬蔑、‘小道消息’，等等。”

## 陈伯达的一些修改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又对文章作了修改，拣其主要多改之处，列举于下：

一、标题“把新闻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改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把姚在文章开头加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战线上经历了和经历着十分尖锐和剧烈的阶级斗争”，改为“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

三、在开头下分第五段中，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代理人，一个个被揪出来了”中的“一个个”删去。又删去姚加上的“那些被反革命分子篡夺的新闻单位，又一个个夺回

到无产阶级手中”一句。

四、在第二大节第二段，概括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时，姚曾加上“总其一点，是赤裸裸地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陈又加上了一句：“为全国右派的猖狂进攻鸣锣开边”。（注：这句话在发表时，在“总其一点”之后还加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

五、在第二大节第三段，批中国赫鲁晓夫说新华社应该“民办”，不要“官办”时，陈（也可能是姚）加了一段：“官办”者，即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使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受到“束缚”，要求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

六、在第二大节第八段，即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关于报纸上“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段中，原文引了毛主席关于舆论一律和列宁在《〈火星报〉编辑声明》的一段话之后，陈或姚加了一段：“无产阶级的报纸，必须旗帜鲜明的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阶级、反动流派、反动思潮作斗争，不进行这种斗争，无产阶级报纸就会丧失自己革命的灵魂。”

七、在第三大节第七段叙述《燕山夜话》一类专栏的作者队伍时，文中说：“那些叛徒、特务，‘三教九流’，半鬼蛇神……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坐上宾”。陈伯达把“坐上宾”改为“反革命打手”。

八、把第五大节第一段叙述文化大革命前夕时的一段原文全节删掉，改成：文化大革命“猛烈地炸开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新闻界的反革命独立王国”。

九、在第五大节第三段姚加的“那些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一个一个被封了，被革命派夺了权”一句中，陈又在“那些”之后，加上“什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在“被封了”之后，加上“被冲了”三字。

十、在第五大节第四段四条“经验教训”中陈歪段歪段地加了大段文字。

在第一条，坚定不移、始终一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段中，陈加了下列内容：

1、“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

2、“特别对于那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鄙作法”。

3、“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这是所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共同的卑鄙手段，我们的报纸必须坚决反其丑而行之。这样，报纸就能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各个时期十分鲜明地为广大革命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

“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前，我们要继续开展对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揭露、大批判。要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批判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毛泽东思想就是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斗争中发白起来的。”

在第二条，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段的末尾，陈加了一段：“要注意人是会变的，必须经常清洗那些腐化分子，不让他们掌握报纸、新闻的工具。”

在第三条，把新闻界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一段中，陈加了下节一段：

在当前，“除了从历史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外，要特别注意批判那种把新闻工具当作某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服务的极端错误的作法。各地报纸、电台等等必须

坚决执行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在第四条，关于精兵简政一段中，陈加的有：

“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必须来一个大革命”。

“应当吸收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到报社来，大量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工农通讯员，打破知识分子成堆的状况。”

“做新闻工作的人，一定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一定要同劳动人民结合，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一定要善于及时反映革命群众中的先进的典型事物，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前进的呼声，一定要贯彻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路线。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办不好无产阶级报纸的，是很容易丧失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解决。”

## “闹而优则仕”不可讹绎成“唱而优则仕”

总社五月十四日转发《人民日报》关于文化部召开大清查一稿中的两处提法：“唱而优则仕”和“跳而优则仕”不妥。

前者是指浩亮，后者是指刘庆棠。一个唱，一个跳，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唱而优”，“跳而优”，有什么不好呢？就是要优嘛！优，说明他们的业务好。

“唱而优则仕”，“跳而优则仕”，有什么不可以呢？政治体现在业务工作上，本职工作做得好，可以提拔当领导干部嘛！

这两句话，说明钱、刘二人之所以爬上文化部付部长的高位，是因为“唱而优”、“跳而优”，即他们的本职工作做得好，而不是其他。这实际上是充分地肯定了“四人帮”的干部路线。

用这两句话，本意是想否定他们，结果却肯定了他们。

“闹而优则仕”，群众创造这样洗炼、辛辣的语言，用来揭露“四人帮”的干部路线，揭露“四人帮”所提拔重用的一些亲信、喽罗的特点，真是一针见血，再好不过。因为“闹”就不对，“闹而优”，还“则仕”，就更不对了。但依此公式，讹绎成“唱而优则仕”、“跳而优则仕”，就不妥当了。因为前提条件变了，由人民不喜欢的“闹”，变成人民需要的“唱”和“跳”了。

冯代松

“唱而优则仕”的提法是错误的，它和“闹而优则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闹而优是坏，唱而优是好。为什么不能提倡戏剧演员唱而优呢？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爬上文化部领导人的高位，并非是借“唱而优”、“跳而优”、“写而优”，而是借的“闹而优”、“拍而优”。他们是借“谢谢妈”爬上去的。

新华社济南军区记者组

